



核心阅读

“互联网+普惠金融”模式能够拓宽金融服务的深度和广度，为传统金融服务未能覆盖到的广大群体提供了便捷的低成本金融服务，成为普惠金融的一个重要方向。推动“互联网+普惠金融”业态的健康发展，要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统一监管标准，运用金融科技手段从被动监管转向主动监管，严厉打击违法催收和网络金融诈骗行为。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前期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和近期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此又做了重点强调。当前，包括房地产泡沫、影子银行、国企高杠杆、地方债务等在内的传统金融领域的“灰犀牛”受到了普遍关注。但是，非传统金融领域的风险仍有待我们深刻认识，并加强此领域的监管。

“互联网+普惠金融”极大促进普惠金融目标的实现

普惠金融是针对传统金融存在的金融排斥现象而提出的金融服务，希望让长尾客户享受到更多的金融服务，建立惠及民众的金融服务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明确提出发展普惠金融。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上强调，发展普惠金融，目的就是要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满意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特别是要让农民、小微企业、城镇低收入群体、贫困人口和残疾人、老年人等及时获取价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

“互联网+普惠金融”模式能够拓宽金融服务的深度和广度，为传统金融服务未能覆盖到的广大群体提供便捷的低成本金融服务，成为普惠金融的一个重要方向。在互联网创新浪潮下，作为“新四大发明”之一的第三方支付正在颠覆银行清算支付，大大便利了中国广大无信用卡人群的消费需求。银行陆续推出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产品，创新了服务方式，降低了服务成本，拓宽了服务渠道和客户来源。一些互联网企业推出的各种理财产品，标志着理财产品通过互联网渠道“进入寻常百姓家”。随之而来的还有大量网上小贷平台和P2P平台，如雨后春笋迅猛发展，惠及大量小微和中低收入群体。

据统计，2016年我国PC端、移动端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分别达到199万亿元和588万亿元，年均增长率分别达55%和258%。2013年以来，网络借贷行业服务的小微企业累计业务量超过2万亿元；P2P网贷小微企业借款从2013年的124亿元增长至2017年的8722亿元，增长超过70倍。其贷款存量已经逼近传统线下8600家小贷机构9600亿元的放款规模。

“互联网+普惠金融”的业态能够快速发展，原因如下：一是有效降低了金融服务的成本，互联网金融的交易成本大约只有传统银行的20%，可以使在传统金融环境下无法盈利的普惠金融业务得以盈利，实现商业的可持续发展。二是有效提高了金融的覆盖面，包括网络借贷、网络理财、网络金融产品销售、第三方支付等在内的互联网金融，不仅满足了更广泛群体的金融需求，而且直接缩小了城乡差别。三是有效降低了信息不对称，互联网“无处不在”的特征有效连接了不同区域的供求双方，以低成本匹配供需信息，实现了对“长尾”人群和需求的覆盖。四是有效提高了服务的个性化，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能够迅速地动态了解客户的多样化需求，有助于互联网金融机构推出个性化金融产品。五是有效提升了对客户风险的识别能力，通过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互联网金融可以对客户的资信状

推动“互联网+普惠金融”业态健康发展的建议

推动互联网+普惠金融在严格规范中发展。据统计我国有5亿人没有进入征信系统，有50%的人无法通过银行等传统信贷渠道获得贷款等金融服务。网络借贷行业的快速发展有其现实意义，有利于压缩非法借贷空间，促进普惠金融目标的实现。必须坚持在规范中发展的思路，不能因噎废食，谈虎色变。

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统一监管标准。要按照“穿透管理”原则，无论某项业务采用何种名称和形式，都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业务模式、产品结构和流程、法律关系和风险特征，明确是否需要纳入监管以及所需申领的牌照类型和适用的监管规则，确保对同类金融业务实行统一的监管标准，防止监管套利，避免“劣币驱逐良币”。

监管要运用金融科技手段从被动监管转向主动监管。在中央和地方层面分别强化互联网金融工作办公室的宏观统筹协调职能，尽快把地方金融办作为具体管理部门的职责做实，职能做强。各地方金融办要解决新兴金融业态无监管系统、无监管数据、风险底数不清的问题，加强非现场监管，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实现在线动态监管，从被动监管向主动监管转变，避免出现“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现象。

经济名词

“灰犀牛”概念首先出现在《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一书中，该书被誉为《黑天鹅》的姊妹篇，作者米歇尔·沃克是美国古根海姆学者奖获得者。灰犀牛体型笨重、反应迟缓，你能看见它在远处，却毫不在意，一旦它向你狂奔而来，定会让你猝不及防，直接被扑倒在地。它并不神秘，却更危险。以重达两吨的灰犀牛来比喻发生概率大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相对于黑天鹅事件的难以预见性和偶发性，灰犀牛事件不是随机突发事件，而是在一系列警示信号和迹象之后出现的大概率。

可以说，“灰犀牛”是一种大概率危机，在社会各个领域不断上演。很多危机事件，与其说是“黑天鹅”，其实更像是“灰犀牛”，在爆发前已有迹象显现，但却被忽视。比如，2007年至2008年的金融风暴，是众多“灰犀牛”汇聚的结果——房地产市场衰退、流动性资金紧缩和居高不下的油价等警示信号就摆在那里。再比如，柯达公司在传统胶卷时代曾占据全球2/3的市场份额，但它固守既得利益，看不到数码技术对自身地位的威胁，因而最终走向没落。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打好防

特朗普减税的前景

□ 王东京

美国国会年前通过了特朗普的减税方案。从今年1月起公司所得税率从35%降至21%，并全面下调个人所得税。消息传开，舆论一片哗然。有评论说，特朗普减税将推动美国经济强劲复苏，同时也可能会引发全球减税大战。为应对美国减税的冲击，国内有学者建议中国政府应未雨绸缪，实施更大力度的减税。

关于减税我曾写过多篇文章，算得上是减税的坚定支持者。事实上，自2009年以来中国政府也一直在推行结构性减税。据官方数据显示，2017年的减税额度已超过7000亿元，降费3000多亿元，共计达1万亿元以上。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减税后对中国经济影响到底会有多大？我的看法，影响一定会有，但不会像有的学者说得那样夸张。至少目前尚待观察，当谋定而后动。

分析美国减税对中国的影响，首先要对美国减税的前景作科学预判。前景是未来出现的结果，见仁见智，人们的看法难免不同，所以对前景作分析需要有科学的方法。何为科学的方法？我曾说过，对未来经济行为的结果，只能用经济学逻辑推测而不能用历史数据预测。逻辑重于数据，历史数据可以用，但只能协助逻辑推理却不能代替逻辑推理。

怎样推测美国减税的前景？根据经济学逻辑，我提出三个推论。

第一个推论：假若美国未来国债和政府支出规模不变，要维持政府支出的现行规模，则未来的应税收入增长必须高于税率的下降幅度。为何作此推论？让我举例解释：假定今年应税收入为10000亿，税率为30%，则政府税收为3000亿。假定明年税率下降至20%，政府要保持3000亿税收，应税收入就需增加到15000亿。这是说，税率下调10%，应税收入就得增加50%，否则税收不可能增加。

美国减税后税收能增加么？有人根据“拉弗曲线”推断说能。不错，“拉弗曲线”说过当一国税率超过最佳税率时，降低税率税收会增加。但我们同时也可以这样理解“拉弗曲线”，当一国税率低于最佳税率时，税率下调税收会减少。现在的问题，美国最佳税率是多少没人清楚，减税对美国究竟是福是祸不好说。而可以肯定的是：美国本次综合减税4%，若要保证总税收不变，应税收入就得增长10%，GDP增长就得增长10%以上，我认为美国不存在这种可能。1981年里根减税后，1983年GDP增长



最高为7.8%；1984年即降至5.7%，之后便一路下行。

第二个推论：假若美国未来应税收入增长赶不上税率下降而且国债规模保持不变，那么政府就必须削减支出。此推论的逻辑是：应税收入增长赶不上税率下降，说明政府税收会减少，而如果政府不增发国债，显然，政府除了减支别无选择。美国减支的空间有多大？我看到的数字，特朗普拟在军费和医保上下手，今后5年将每年削减1000亿美元。

不过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未来几年美国政府支出却可能会增加。据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OM-FIF）的一份研究报告称，今天美国的基础设施已十分陈旧，急需修缮，而且基础设施又是特朗普政策框架的核心之一。该报告估算，美国基础设施总缺口约在3.6万亿美元左右，其中交通基础设施约2万亿美元、电力基础设施约7360亿美元、学校约3910亿美元。麻烦在于，美国私人企业并不热衷基础设施投资，PPP也不流行。由此看，美国减支的余地并不大。

第三个推论：假若美国政府支出不能减少，而未来应税收入增长又赶不上税率下降，那么政府弥补预算赤字就必须增发国债。事实确也如此，特朗普为了给减税铺路，之前就提出10年1.5万亿美元的扩债计划，而且去年10月已获国会批准。扩国债意味着什么？“李嘉图—巴罗等价定理”一语道破：“今天的债就是明天的税”。是的，政府借债最终要还，还债的钱从哪里来？当然只能来自税收。这是说，政府发债越多，未来纳税人的税负就会越重，政府发债不过在是预支

明天的税。

众所周知，美国是当今全球最大债务国，至2016年底总债务达20.17万亿美元，政府债务负担率超过了100%，人均负债6.28万美元。读者想想，美国原本债台高筑，若再扩债不加税拿什么还债？当年里根执政后也推行过减税，可随后几年便上调各种关税；1982年加大了对企业的税收，1983年提高了工资税，1984年提高了能源税；到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将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从31%提高到39.6%。

上面三个推论，其指向很明确，一句话：美国今天减税，日后必然加税。事实上，美国现在就在一边减税一边加税。不是吗？比如新的税改方案一方面提高个人所得税抵扣，同时又取消了原来每人每年4050美元的抵扣标准，这样一来，人口多家庭的税负反而比以前更重。要是读者同意我上面的推论，那么本文的结论是：特朗普减税前景不容乐观。

特朗普实施减税，目的是要吸引国际资本到美国投资。特朗普最后能否如愿？我认为很难。我们知道，国际资本流动不只取决于税率高低，同时还受原料产地、消费市场、用工成本等诸多因素的约束。而在这些方面美国并无优势，所以特朗普希望用低税率吸引国际资本的想法，恐怕只是一厢情愿。再说，国际投资者不蠢，明知美国今天减税日后会加税，谁会把企业搬到美国去？



力量的必然要求。新时代作风建设要求高级干部自觉践行“三严三实”要求，加强道德修养，守底线，明红线，不碰高压线，做到心有所戒、行有所止，坚决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以过硬的作风凝聚党心民心，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坚持全面从严治政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这要求我们牢牢守住先进性和纯洁性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始终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祛病疗伤，激浊扬清。

党的十九大报告鲜明指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全党要清醒认识到，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要深刻认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深

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既要培元固本，也要开拓创新；既要把握关键重点，也要形成整体态势。要坚持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的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今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正站在一个无比宽广的历史舞台，带领具有无比深厚历史底蕴的中华民族，聚合13亿多中国人民的磅礴之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一以贯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锐意进取，奋勇前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

推动「互联网+普惠金融」业态健康发展

□ 张 巍

加快信用数据共享体系建设。加速推动“信联”在线征信平台建设，加强征信资源共享，帮助网贷平台有效实现反欺诈、多头贷款识别和信用不良用户的识别，提升行业整体风险控制水平。

完善信息披露和金融消费者教育与保护机制。明确网络借贷机构的信息披露义务，信贷机构在向借款人发放贷款时必须对贷款金额、手续费、利率等以书面方式加以规定，并以年化利率的形式明确标识。要加强消费者金融知识教育和信用意识教育，培养投资者“买者有责，风险自负”的风险防范意识。在推行互联网借贷平台信息披露制度的同时，还应注意保护个人隐私信息，避免不法分子利用个人隐私进行诈骗等活动。

严厉打击违法催收和网络金融诈骗行为。明确网络借贷催收行业主管部门，建立准入标准。支持规范、合规的债务催收公司的发展，严厉打击违法、涉黑的催收公司。不断完善对金融机构债务催收外包的监管。加大对非法集资和金融诈骗的打击力度，强化金融机构的监督、报告义务。

探索建立个人债务封顶机制。个人破产制度是对金融消费者的巨大保护，但是对全社会层面的信用体系建设要求较高。在目前我国信用体系建设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建立个人债务封顶机制，即在单一平台借款的债务总额（包含利息、各项费用等）不能突破本金的一定倍数，以有效解决复利计算带来的债务快速膨胀的问题。



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既要防“黑天鹅”，也要防“灰犀牛”，对各类风险苗头予以高度重视，更加自觉地防范各种风险。发现“灰犀牛”、盯紧“灰犀牛”，才谈得上有效应对“灰犀牛”。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要把主动防范化位置，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科学防范，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而这无疑是应对金融领域“灰犀牛”的正确姿态。